

王觀堂後期學術與京滬學界關係考論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Guowei's Academic Pursuits and the Scholarly Circle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汪晨旭 (Wang Chenxu) *

前言

王觀堂丙辰(1916)歸國後的著述之宏富，成就之斐然早為學界矚目，然針對其後期學術的專題研究仍然有限，對其後期生涯與治學演進之關係的討論至今付諸闕如。有鑑於此，拙文擬就相關議題加以考索，以揭示：考察王觀堂這類近代轉型之際學人的生涯與學緣圈對其學術之影響，可彌補僅聚焦學術著作以闡釋其學術演進之不足。

一、滬上名流身分之確立

自光緒三十三年(1907)因供職京師離滬後，觀堂約有十年時間未再集中寓滬。丙辰歸國，適羅振玉留寓日本，觀堂面臨獨自一人謀生滬上之處境。幸羅氏早為其籌劃生計，觀堂之生活不至困苦。1914年初，羅振玉因事歸國，已有意為觀堂謀求出路：

弟在此，與賈人中之有資本者議接續《國學叢

刊》(即前所謂《文學雜誌》之改變)，請公任其事，弟助理之(此時請告小兒等勿宣)，月脩百元左近(與索百二十元，尚未定，大約至少百元也)，與訂一年之約，一年以後，觀其銷行何如，再行續訂。其詳細辦法，俟面談。此事若定，雖公可免歲餘衣食之憂，然又不免寫清稿之勞矣。¹

後觀堂應鄒安之邀進入倉聖明智大學辦《學術叢編》報，而此前羅振玉已與鄒安有過文物往來，則觀堂入倉聖明智謀生或有羅氏助推。²受聘倉聖明智不久，觀堂因不恥姬彌為人，擬辭去教職，羅氏望觀堂以學術為生，特為其陳言利害：

弟所以以此相勸者，辦學報與公平日學術，有益無損，學堂則是長局。(中略)弟所知，若往昔楊子安之在廣學會，月謝百番，抗父諸君在商務，月薪亦百餘番，然每日必犧牲六七點鐘，除去往復鐘點，人已疲極，不復能修他業，若歲歲如此，學業終身無增長，況尚須我求童蒙，且

* 作者現為溫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生。本文係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浙江戲曲家年譜編撰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1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36封)，《羅雪堂合集》第8函第6冊(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引文括號內註，未另標明者皆係原刊所有，特此說明。

2 入倉聖明智大學謀生是觀堂歸國的原因(王國維，〈丙辰日記〉，收於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頁734)。李績恩曾探討哈園選擇觀堂辦報的原因(李績恩，〈愛儷園夢影錄〉，收於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37)，但更為現實的原因是王氏曾協助羅振玉創辦《國學叢刊》，有著相關經驗。

(以下原件破損，少約二十字——編者注)者，而可決也。³

觀堂終因羅氏勸慰留倉聖明智創辦《學術叢編》，學報以刊印古書為重要內容，羅振玉即將大量藏書借予付印，以支持其工作。如云：

茲檢徐星伯從《永樂大典》殘本輯本《經世大典》《馬政》一冊，《沈館錄》三冊（高麗寫本），《嵩陽石刻》二冊（抄本），《儒林宗派》二冊（四庫寫本），《專文考略》一冊（稿本），請屬妥人寫之，勿汙損為荷。以後所用之書（三年亦數用），弟親攜交可也。⁴

此外，羅氏還代哈同採買古籍，無疑有助於觀堂同上司關係升溫：

《大藏經》已購就，共一百五十套，目錄一套，裝一大箱。今日交運送店寄哈同花園姬、鄒兩君矣。《瑜伽論》則尚未印成，容續寄。⁵

羅氏諸多努力，皆為觀堂能在哈同花園站穩腳跟。此外，羅振玉還積極促進觀堂與遺老群體的交往。如勸其同梁鼎芬交：

節老書來，服公甚至。此老樂善之誠，至可敬，弟意公當一往見之。此老孤懷清節，亦並世所罕覩，又頗有收藏，曾有蘇題文竹，頗知名，但末之見，公何不往觀之乎？⁶

而羅氏贈予遺老之書，又多由觀堂經手，殊為其贏得不少好感。且羅氏有意為觀堂謀劃生計，如其致函繆荃孫為觀堂謀事劉承幹處：

頃得靜安來書，言明年辭哈同編報事，海寧聘修

州志，亦不就。前在滬，勸返東寓，則又不忍重為玉累，故此刻未能再申前請。靜公文章行誼，並世無雙，夙在長者洞鑒之中，而其狷潔性成，不欲苟就，同好不能不為代謀。前作書翰怡京卿，若以纂述校勘為托，必當樂就。玉與翰怡僅一面，遽作此函，未免唐突，幸長者再為一言，必可安賢者，想亦長者所樂許也。此事出自鄙意，尚未告靜公，若翰怡許諾，祈示知，玉再告靜公也。⁷

事實上擴大了觀堂的交友圈。而觀堂能於滬上迅速立足，亦與其作為羅氏在國內的代言人相關。觀堂為羅氏大量採買古籍、文物：

古書流通處之目，弟未見過，而盧氏《抱經堂目》則有之。渠有《會稽續志》，求代購。陶心雲碑帖恐無佳者，茲將單上加○者，請代購，此選請與議價可也（恐皆近拓，不值錢），其加○者，請一檢查，若系舊拓，即購之（但請先示件示價），其原單上所開《隨常醜奴志》（即《隋常醜奴墓志》），此弟求之多年尚未得者，若非石印，請迅代購，因此石久佚也。趙大年卷，前在上海購之未得者，頌清又托西人名來售，價至千元。未購成以前（勿告人）當與磨蹉，或與此君尚有墨緣也。⁸

檢羅、王往來書札，觀堂為羅氏採購古籍文物之多，數額之巨，令人嘆服。憑藉羅振玉的財力和人脈優勢，加之職務緣由，觀堂確有蒐訪古籍文物之需，其與滬上收藏家之交往，實多有契機。此外，滬上亦居大不易之所，遺老群體往往需出售藏書以充生計之資，留寓日本的羅振玉事實上代表著巨大的海外市場，故遺老群體亦樂與觀堂往來。因頻繁打探文物消息、出席文物展覽

3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71 封），《羅雪堂合集》第 8 函第 6 冊。

4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77 封），《羅雪堂合集》第 8 函第 6 冊。

5 1916 年 3 月末羅福萇致觀堂，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 50。

6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115 封），《羅雪堂合集》第 8 函第 6 冊。

7 1916 年 12 月 18 日前後羅振玉致繆荃孫，王慶祥、蕭文立校註，《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 212。

8 為便行文，原註有節略。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132 封），《羅雪堂合集》第 9 函第 1 冊。

宴，觀堂為時人目以名流，而觀堂應亦知悉此事。如云：

尤可笑者，某君謂人，謂彼處印此雜誌，乃為維揚名。景告以人家得名久矣，不待此雜誌，且此事本兩相借重云云。⁹

又，朱彊村亦邀以序其〈校詞圖〉，觀堂〈序〉略云：

先生少長於是，垂老而不得歸，遭遇世變，惟以填詞刊詞自遣，蓋不獨視古之鄉先生矜式遊燕於其鄉者如天上人，即求如樂天、永叔諸先生退休之樂，亦不可復得，宜其為斯圖以見意也。夫有鄉而不得歸者，今日士大夫之所同也。而為圖以見意，自先生始。故略序此旨，且以紀世變也。¹⁰

自文意觀之，顯系以同輩自居。其時為彊村序文或題詠之名流尚有沈曾植、葉昌熾、孫德謙、張爾田、胡嗣瑗、陳三立、楊鍾義、繆荃孫、鄭孝胥、瞿鴻機、夏敬觀、黃節、吳昌碩等，¹¹足見觀堂於滬上學林之地位。

而時人欲與日本漢學家、收藏家相往來，亦多須經觀堂紹介，如日本漢學家富岡謙藏、內藤湖南等1917年來華事。宣統二年（1910），京都大學五教授赴京師學部考察敦煌寫卷，觀堂因與富岡氏相識。辛亥年末，羅振玉因富岡氏等之邀流寓京都，觀堂定居京都不久，即撰詩〈定居京都奉答鈴木豹軒枉贈之作並東君山湖南君拗諸君子〉四首以記此事。寓居日本期間，羅振玉與富岡氏等多有來往，¹²觀堂想亦在側，職是之故，富岡氏赴滬即拜訪觀堂，而羅氏亦叮囑觀堂多加照顧：

富岡不日赴滬，將訪公。弟意似宜以酒食答之，主客各一人可耳。前請公紹介諸人，弟已各致小

物，以尊名贈之矣。¹³

觀堂也應羅氏之托，陪同富岡氏走訪滬上藏家，據其復函：

富岡君到後，因語言不便，將一切介紹事，盡由維辦理，已與之同訪乙老及藝風，昨日並觀徐積餘藏鏡及銅器。藝亦來徐處與之同訪張石民，觀諸宋本，星期日約定觀劉翰怡書，則其事了矣。劉蕙石入京未歸，瞿良士去做議員，故富岡君至常熟恐不得觀書耳。張石民家有一新興鏡，與《圖錄》所載者略象而多一句，富岡得其拓本，甚得意。（中略）乙老與富岡談甚喜，積餘待客亦周摯，並聞。¹⁴

滬上開明之士樂於日本漢學家相交，而觀堂於留日之際已享負盛譽，自然成為其時溝通中日學界交流的重要橋樑。

觀堂還因其學術（如敦煌學）頗受學界重視。從1910年到1920年，在大量日本漢學家奔赴歐美抄錄敦煌材料時，中國學者除張元濟因公事得訪英法，獲觀部分敦煌遺書外，幾乎無人直接前往歐美進行相關研究工作，則羅振玉、王觀堂實為我國對敦煌資料佔有最詳盡、研究最深入的學者；¹⁵加之，羅氏對於敦煌資料的整理仍在進行，故國內學人意欲獲取敦煌資料，不能不訪謁觀堂：

曹君直今年辭鐵路事，在劉聚卿處為之校書，並為李審言代館。渠頗研究敦煌事，而公至東後所印之書，未見一種，約至維處觀之。渠亦謂《敦

9 1916年9月30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172。

10 王國維，〈「彊村校詞圖」序〉，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頁621-622。

11 筆者未見龍榆生輯，《彊村校詞圖題詠》，名單披露據孫雨晨，〈清末民初士人的心靈書寫史——朱祖謀「彊村校詞圖」題詠闡論〉，《美術學報》1（2019.1）：33-39。

12 參看王欽賢，〈羅振玉的學術交流與研究——以流亡日本期間為中心〉（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20），頁60-62。

13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204封），《羅雪堂合集》第9函第1冊。

14 1917年3月23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235-236。

15 觀堂和羅振玉還是當時為數不多能與英法敦煌學家保持密切聯繫的中國學者，參看賀夢瑩、周霄漢，〈羅振玉致法國漢學家沙畹未刊書札十四通考釋〉，《文獻》3（2023.5）：170-192；祖豔馥等編著，《史與物——中國學者與法國漢學家論學書札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86-131、144-150；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495-497。

煌新錄》求之數年，無知之者也。¹⁶

而從觀堂處流通之敦煌資料亦頗為遺老重視，敦煌學如是，甲骨學學亦如是，則觀堂之為學界仰重可知矣。誠然，真正奠定觀堂學術宗師地位的，是其此數年先後發表的一系列具有典範意義的學術論文，然而，倘無觀堂在學界的隆赫地位，這批新見迭出的論文在學界又能否引起巨大反響？恐怕將打上不少折扣。

二、沈門問學與觀堂治學格局之日益闊闊

自 1915 年與沈曾植始訂交，沈氏可謂觀堂滬上最重要的學友（羅振玉此數年間先在日本，回國後在天津），觀堂問學沈氏，對其治學格局之日益闊闊頗有助益。沈曾植「天才學力並絕等倫」，¹⁷ 觀堂頗推許其治學有可借鑑處。如云：

乙老談論須分別觀之，時有得失。得者極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若孫仲老輩則篤守古法，無甚出入矣。¹⁸

因欽慕沈氏之學，觀堂於著述中多發明沈說，其〈樂詩考略〉「末條用其說為之闡發」，¹⁹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專述乙老口說並與乙老談論之語」，²⁰ 觀堂還時向沈氏請益學問，即使在自身較為專長之領域亦如是，如請沈曾植研究《高昌壁畫》及《石鼓考釋》等。²¹ 又，觀堂還代沈氏抄錄詩稿。云：

連日苦寒，硯池皆凍，以火炙之始得作書，而抄

寐叟詩得五十紙。壬癸甲三年詩已畢，已卯詩前已寫出，嗣擬編壬癸詩為一卷，甲乙詩為一卷，每卷各得三十餘頁，故已卯詩尚須再錄一過，如此則與此次所抄一律。²²

如此種種，自沈曾植觀之，似以為觀堂有師事之意，故其對觀堂之提攜亦頗費心。如沈氏欲延以修浙江通志，觀堂辭云：

維答以哈園現正在議留，彼固不可與共事，然於研究學問則可由自己所好者為之；若《通志》則因素無研究，又範圍太廣。現彼處尚在維繫，是以或從緩議。²³

而沈氏力邀之，並詳為指導：

舊志於前朝事實誠多疏略，然如地理人物，補遺則易，經政各門，補遺則難。（中略）若山川諸門，宋元舊志自可據所見者儘量補之，有征則詳，無征蓋闕，著之端簡，標為義例，無不可也。如慮卷帙太繁，則去其與明志同者，更張太甚，似無此慮。列舉六事，所謂讀一省之志不可不知一省之事者，此固讀書之士心所同然。常氏《華陽》，早開茲例，粵西前事，見許通人，第猶病其兵事偏詳，他端未稱。今擬仿史表例為大事表，以舉其綱；仿紀事本末為大事錄，以詳其目。（中略）近代事如浙東義兵、湖州史案之類，前人記載，事蹟綦詳，非有專篇，不能委備。以古准今，則裘甫、方臘之騷亂，建炎、德祐之播遷，皆以紀事本末體敘之，亦《國語》

16 1916 年 10 月 28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186。

17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115 封），《羅雪堂合集》第 8 函第 6 冊。

18 1916 年 12 月 14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08。還可參看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706-708。

19 1916 年 12 月 14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08。

20 1916 年 12 月 20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10。

21 1916 年 9 月 9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161。

22 1917 年 1 月 5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20。

23 1916 年 12 月 18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09-210。

《越紐》之遺意也。²⁴

餘如名物、學術等有關事項，沈曾植亦多有提點，此舉無疑深裨於觀堂之學術格局。治古學一道，前輩之引領向不可或缺，而觀堂周邊始終有深耕相關領域之宿耆。其治詞學有吳昌綬點撥，治版本目錄得繆荃孫啟迪，治古器物賴羅振玉提攜。流寓日本期間，觀堂的治學規模逐步奠定，其精慎的治學風格也得以形成；歸國旅滬期間，與沈曾植之切磋使觀堂治學愈發注重根柢（小學），其治學格局因以愈發闊闊。其因沈氏之教導，觀堂學問進展迅猛，尤以聲韻及西北史地之學成績斐然。²⁵ 據觀堂致勞乃宣函：

國維去歲正月自日本歸滬，為英人哈同君編纂《學術叢編》雜誌，幸能不廢舊業。比年研究古韻，覺此事自段、孔後至王石臞、江晉三兩家殆已完成。因思繼錢竹汀、陳蘭圃之業，研究古代字母，自六朝反切、漢人聲讀以上溯三代。負此宏願，未易遽償，堪為長者告者，惟此而已。²⁶

觀堂數年間以研究古字母為志，無疑受到沈曾植影響。可由沈氏復函推知：

承詢字母古學，自唐以後，陳氏《切韻考》已得會通。第六朝與隋唐似不能絕無異同，兩漢與隋唐則顯有異同。凡在後世為類隔者，在前世皆音和也。《釋名》純是雙聲，且為音和之雙聲。昔嘗以此證漢與隋唐同異，過此以往，未易可言，然循此以往，亦非必無可言者。²⁷

觀堂治聲韻，頗重視材料之考證，如〈書巴黎國民圖書

館所藏唐寫本切韻〉詳考陸法言事蹟，〈書吳縣蔣氏藏唐寫本唐韻後〉考寫本為孫愐唐韻，〈李周切韻〉之考李周其人等；又重材料之搜羅、分類。如云：

前日輯寫古金文之有韻者三十餘器及石鼓文，為〈周代金石文韻讀〉一卷。向來古韻材料，只有《毛詩》《楚辭》、群經、諸子，此卻為自來論韻者所未及。然其結果，不能出諸家研究所得之外。²⁸

觀堂每有所得，輒與沈曾植相磋商，其於聲韻一道之造詣日臻高妙。至於觀堂治西北史地學頗受沈曾植所啟，本為定論，近來卻有作翻案文章者，似據觀堂「開始有意識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的時間節點正好是在 1919 年，他的所有涉及西北史地研究的論文、著作幾乎全部寫於本年之後」，²⁹ 而推定觀堂的學術轉向直接受伯希和〈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影響。此說實非，觀堂後期學術轉向主要為材料限制所致：

王國維寫出〈殷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周制度論〉以後，在甲骨學的研究上就沒有更大的突破。比如甲骨的綴合、斷代等不再有更深入的研究。這裏的原因也是很清楚的。因為王國維研究甲骨學，主要依據羅振玉、哈同所藏甲骨片，待將這些甲骨片初步研究以後，成果發表了，此後再沒有見到新的資料，研究也就不再繼續下去，而轉向了其他史學領域的研究。³⁰

觀堂治上古史諸文皆作於 1917 年，至次年 11 月觀堂寫定《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後，甲骨之學不再成為羅、王往來論學中的重點，取而代之以敦煌學、聲韻學

24 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21），頁 323-324。許全勝謂此函作於 1916 年 1 月 2 日，然由文意推斷，則觀堂應已入通志館也。

25 觀堂的魏石經研究、《水經注》研究也受到沈曾植啟發，參看程克雅，〈王國維魏三體石經古文參斟合證方法探究〉，《傳統中國研究集刊》6（2009.6）：368-388。還可參看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頁 713。

26 1917 年 12 月 11 日觀堂致勞乃宣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490。

27 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 325。

28 1917 年 7 月 23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252。

29 胡章龍，〈王國維譯伯希和講稿史事考——兼論王國維晚年的學術轉向契機〉，《歷史教學問題》5（2024.10）：44-50、60、179。

30 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匯與王國維學術成就》（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 271。

等。換言之，即使觀堂並未讀到伯希和文，其學術轉向仍將持續推進。另外，論者但言觀堂寫作〈九姓回鶻可汗碑跋〉綜合多種史料，卻不言沈曾植導夫先路，誠令人困惑。沈曾植〈唐□姓回鶻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跋〉云：

此碑在喀喇庫魯木城中，喀喇庫魯木即元世之哈喇和林，《唐書·回鶻傳》之回鶻城，《會要》所謂「常居北山以比長安」者，《遼史·太宗本紀》之古回鶻城，《元史·巴爾術阿爾忒的斤傳》之別力跋力，皆一地也。碑文殘闕，文無首尾，亦無年號歲月，不能知為何時所立，以文中所述諸汗事蹟考之，當在真元中。³¹

沈跋並考得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之身分，而此文之主要觀點與考證法，幾乎全為觀堂〈九姓回鶻可汗碑跋〉繼承，特考證更為充分。此外，觀堂考證西北史地多用聲韻學，亦為清中葉來此學之傳統，³²顯亦得自沈氏指點。又，據觀堂所言：

前沈先生跋此碑時，僅據前三段及第七、八段，今得通讀全碑，自有前跋所不能盡者。先生因命書其後。凡前跋所已詳者，茲不贅焉。³³

「命書其後」幾可坐實觀堂與沈氏在西北史地學上的師生之誼。而觀堂在清華園所撰《蒙古史料校注四種》之三—《蒙韃備錄》、《黑鞏事略》、《長春真人西遊記》均經沈曾植校注，足見沈氏對觀堂後期學術路徑之引領作

用。³⁴

三、觀堂後期學術之新變

王氏及門弟子吳其昌曾認為觀堂乙丑年（1925）後學術面貌為之一變，「專治西北地理史事」，³⁵需明確，觀堂治學之新變須待內外因緣具足方能發生，下文以觀堂治蒙元史始末為例說明這點。

有論者指出，「四裔研究」是觀堂學術版圖的重要部分，「四裔就是四大邊疆，四大邊疆連著周邊鄰國，史書列入蠻夷列傳、諸蕃志。這是中國大歷史的另一半，範圍更大的一塊。漢簡研究、敦煌研究，都跟這一研究有關」，³⁶蒙元史不僅對觀堂有著巨大的吸引力，³⁷甚或就是觀堂學術延伸的不二選擇。

至遲於1918年7月30日，觀堂已涉獵蒙元史研究。有函云：

鳳老之書脫字、誤字甚多，蓋從草稿寫出，未曾一校者。其圖亦然。今將已畫之圖與原書一校，僅校二圖而知二圖中脫字已不止一二，因之其圖全為無理法。此非得鳳老自校或知算者一校，將來笑話必滿紙皆是。此書如何辦法，請示為荷。³⁸

觀堂是時校柯劭忞（鳳老）《新元史》應由羅振玉授意。羅振玉曾與柯劭忞有過學術往來，他為柯劭忞治學提供大量文獻資料，並資助柯氏出版著作。柯函云：

承示欲助費刊鄙著《元史》，感戰無似，但愧不

31 沈曾植，《海日樓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8），頁132。

32 可參郭麗萍，《絕域與絕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156-158。

33 王國維，〈九姓回鶻可汗碑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8卷，頁501。

34 還可參看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頁712-714。

35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學述〉，《詩詞文在》（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頁45。

36 李零，〈絕筆春秋：王國維與清華——在清華大學「王國維學術講座」的演講〉，《出土文獻》2（2023.6）：130-153。

37 觀堂於1916年9月前後已刊印過《大元馬政記》（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168），是時，觀堂正專治三代之學。觀堂對民族問題的學術興趣，可參看其〈詠史〉（五首其四），陳永正箋注，《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178。關於觀堂治蒙元史的起因，伯希和認為受到「中亞使團帶回了大量的資料」和「蒙古人升允的影響」（伯希和，〈王國維〉，收於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頁354），戴家祥認為是有所感於國人不知「海外學者研究之成果」（戴家祥、王季思，〈王國維先生墓碑記〉及其他），同上書，頁263）。

38 1918年7月30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351。

敢當耳！擬脫稿即郵寄公與靜庵閱之，再議剝
剝，今固不敢領此款也。³⁹

當在 1918 年間，柯著脫稿，並付與觀堂校閱。1918 年
11 月 22 日，觀堂開始記錄沈曾植的邊疆史地研究：

（沈曾植一引者）又言其所校注《蠻書》《黑韃事
略》《聖武親征錄》等共約十種，均有標識，而
未詳引書籍，欲寫定之須一歲之力，擬努力為
之。然恐無此事耳。⁴⁰

此後，在從事敦煌學研究時，觀堂的學術重心逐漸向邊
疆史地傾斜，並於是時獲睹伯希和〈摩尼教考〉。⁴¹ 據其
致羅振玉函：

伯希和君所撰〈摩尼教考〉所搜集中土書籍材料
略備，因錄出之。中引和林所出回鶻愛登里可汗
碑，詢之乙老，乙老出一錄文本相示，校以伯氏
所引，則伯氏所見本校乙老所錄本每行多出二十
餘字。蓋以碑斷為三截，乙老所錄者僅上二截，
而伯氏所見多出下半截。⁴²

法國漢學家對中國邊疆史地文獻之熟稔，對有關材料搜
羅之辛勤，頗令觀堂驚訝。觀堂或因此發願於此學超越
法人，而向沈曾植問學，〈九姓回鶻可汗碑跋〉即是這
一時期的學術產物。1919 年 8 月 15 日，觀堂得見伯希
和之就職演說：

前日在君楚處，見伯希和君八年前之就職演說，
始知近年西人於東方學術之進步。伯君此文，益
將近日發明及研究之結果總括言之，於學術關係

極大。故榭博士為譯之，載諸《藝文雜誌》上。
其所言新疆南北路古代多行波斯一派之言語文
字，此發明至為重要。因憶我國古書西域諸國漢
時謂之西胡，自晉宋以後專稱之曰胡，唐人於突
厥及胡分析至嚴。蓋胡者，實自西域西迄波斯之
總名，而北之突厥、南之梵皆不與焉。近來言語
學之發明與古籍吻合，豈非大快歟？維因擬作
〈西胡考〉，將古書所云胡者集為一書，亦快事
也。⁴³

演說為觀堂帶來了不小啟發，然論者云「王國維正是在
讀到伯希和此文的日語譯文後，才有意識地關注到西域
歷史、語言問題，伯希和的這篇講稿應當是其晚年學術
轉向的直接動因」，⁴⁴ 恐言過其實。觀堂西胡諸考所用學
術方法，仍與其先前修學之「分類法」一脈相承。又，
據「因憶」可知觀堂於有關領域已有較為深厚的積澱，
則講演實無左右觀堂治學方向之力也。

觀堂真正轉向邊疆史地研究不早於 1922 年。1922
年 4 月，羅振玉為觀堂介紹漢學界之新發現：

薛博士所贈《樓蘭》，乃薛所發見，作者以德文
記之，恐是德人也。已屬大學諸君先譯一序矣。
昨英國薛博士寄到《樓蘭》一冊，其中斷爛之尺
牘不少，其書以德文（瑞典）作解釋，當攜交叔
平，遣人譯其序，然後加以考訂。⁴⁵

羅振玉時任法國博士院考古通信員，⁴⁶ 觀堂也因此與國
際漢學的邊疆史地熱潮發生了緊密聯繫。論者指出觀堂
後期之學「不僅是古今學術的結合點，也是中外學術的

39 房學惠，〈羅振玉友朋書札〉，《文獻》2（2025.4）：42-56。

40 1918 年 11 月 22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371。

41 觀堂這一時期的治學應有受到羅福萇（君楚）影響，見王國維，〈羅君楚傳〉，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8 卷，頁 603-604。觀堂是於羅福萇處得見伯希和〈摩尼教考〉與「就職演說」的，因羅振玉、觀堂獲法文資料後多先交由羅福萇譯出。

42 1919 年 7 月 27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390。

43 1919 年 8 月 17 日觀堂致羅振玉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393。

44 胡章龍，〈王國維譯伯希和講稿史事考——兼論王國維晚年的學術轉向契機〉，《歷史教學問題》5（2024.10）：44-50、60、179。

45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 485、486 封），《羅雪堂合集》第 9 函第 4 冊。

46 1922 年 3 月 21 日羅振玉致觀堂函，王慶祥、蕭文立校註，《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 525。

結合點」，他的治學「越來越轉向四大邊疆，轉向蒙古和中亞」，即是「越來越國際化」，⁴⁷這是頗值得注意的。

然需注意，學界的研究動態並非吸引觀堂參與此學的直接因素，一個重要原因是觀堂並未掌握任何一門東方語言。真正推動觀堂走向蒙元史研究的，應是內閣大庫中蒙元史料的發現。1922年6月22日，羅振玉致函觀堂討論有關史料：

弟連日整理內閣史料，竟發見奇籍二種，皆蒙文，且稿本也（有塗改處。）即此二書，已值萬三千金。一為西遼史書（二冊），敘述甚詳，知德宗以前尚有宣宗，改年天復。西遼事實，《遼史》中至陋，得此書，若譯出，其可貴尚在蒙文《元秘史》之上。又二冊為《大元例》，其一冊署第十八，他一冊無漢字書題。他日當先以西法影照，原本已黴爛，不敢以付譯人也。又有蘇祿國表文（明代物），夷漢兩文並列，漢文乃譯音，無一語可解，亦奇物也。此事亦望轉告乙丈，於煩惱中，為之一笑也。⁴⁸

新發現的蒙元史料為觀堂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而沈曾植（乙丈）可能給與的勉勵也對觀堂的學術起步有著不小促進作用。⁴⁹羅振玉又致函云：

庫籍中滿蒙文書為第一，惜無通其文者。前檢得《遼史》及《西遼史》、《元例》四冊外，頃又得《大元史書》一本，尚有類似者二三冊，異日入都，當聘一熟悉精蒙文者來從事移譯，並擬令

（兒輩）受學。⁵⁰

內閣中的滿蒙文獻數目既多，恰說明了蒙元史大有可為。不通蒙滿文並不是觀堂的主要障礙，⁵¹在涉足蒙元史時，觀堂仍沿用他所擅長的治學路徑——立足基本文獻，重視材料辨析。⁵²如云：

近研究蒙古初期史料，乃知南宋人偽造許多書籍，如《征蒙記》等皆宋人所造也。⁵³

因有深諳蒙元史的宿耆為觀堂提供學術指導，其最後一次治學轉向也得以迅速完成。沈曾植為觀堂1918-1922年間最重要的學友，1922年11月，沈曾植辭世，1923年5月前後，觀堂入直南書房，並與柯劭忞保持密切的學術往來。這份親密離不開羅振玉的助推，羅振玉曾致函觀堂：

弟大約仍是十二入都，十四出都（以後無要事即不入都），都中舍公與鳳老外，實無第三人可共語，不得已，但有瑞老與揖先耳。⁵⁴

滬上時期，羅振玉曾勸觀堂與沈曾植相親善，觀堂因師事沈氏。入直南書房後，同樣因羅振玉的建議，觀堂與柯劭忞保持密切往來。由於觀堂不喜多談朝政，學術仍應是柯、王交流的重點。據羅振玉函：

弟所得《元稅籍》，以《元史》考之，如正稅比附增稅等，及收稅官吏，史皆不詳。茲記其大略，請公考之，若晤鳳老詢問，尤感。⁵⁵

47 李零，〈絕筆春秋：王國維與清華——在清華大學「王國維學術講座」的演講〉，《出土文獻》2（2023.6）：130-153。

48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490封），《羅雪堂合集》第9函第4冊。

49 關於觀堂研究蒙元史地時之心態，可參看1925年10月23日羅振玉致觀堂，1925年11月15日觀堂致羅振玉，王慶祥、蕭文立校註，《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648-649。

50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491封），《羅雪堂合集》第9函第4冊。

51 雷紹鋒云，少數民族傳難讀之處在於「一、傳主姓名；二、職官名；三、訛誤、缺脫、增衍等」，《王國維讀書生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頁178。

52 可參看雷紹鋒，《王國維讀書生涯》，頁234-241。

53 1926年12月下旬觀堂致馬衡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672。

54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611封），《羅雪堂合集》第9函第4冊。

55 羅振玉，〈永豐鄉人書札〉（致觀堂第617封），《羅雪堂合集》第9函第4冊。

則觀堂與柯或有師弟之實，可推知也。⁵⁶ 尚需指出，觀堂治元史，還曾參考大量日本漢學成果，據學者披露，有「東京大學贈《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十一冊」，「托神田喜一郎在日本代購《成吉思汗實錄》《史學雜誌》《東洋學報》等」。⁵⁷ 上述書目中的《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尤為觀堂重視，《觀堂譯稿》中的〈室韋考〉〈遼代烏兒敵烈考〉〈韃靼考〉分別譯自《報告》的第一冊、第二冊、第五冊；《報告》包含邊疆史地研究及少數民族政權研究，觀堂主要參考其中的蒙元史地部分。⁵⁸

1925年，觀堂曾為內藤湖南六十大壽寄贈新作〈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⁵⁹ 此文無疑是對日本漢學家箭內互所著〈元朝斡耳朵考〉的回應，其〈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更是直言欲於蒙元史領域同東人爭勝。⁶⁰ 觀堂每一次的學術轉向在趨向冷僻與專深的同時，也愈發趨向國際學術潮流，則觀堂治學應存為國爭光之意。

四、北大、清華的國學研究與觀堂之學術活動

學界皆知，觀堂曾先後同北大、清華開展合作，然少有人留意，觀堂與北大學人的往來對其清華時期之學術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1917年9月1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委託馬衡來書，欲聘為該校文科教授，觀堂復書婉謝之。⁶¹ 至1918年，北京大學三度禮聘觀堂。1919年12月9日，馬衡首次當選北京大學圖書委員，⁶² 在此後數年與觀堂交往的過程中，馬氏始終負責北京大學的文獻資料管理。有論者認為，觀堂與北大保持聯繫考慮到了資料因素：

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之前，學者群體雖然龐大，學術交流雖在進行，但在交流的方式上更多的是函札往返、見面討論以及互贈著述等，這對於學術資訊已趨發達的20世紀20年代前後來說，畢竟聞見有限，眼界不廣。即使當時處於學術第一線且饒有國際影響的羅、王二人，也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羅振玉從日本回國定居天津之時，雖然意緒多端，但對中州各地出土文物仍是非常關注，而當時任職北大的馬衡即在考古資訊上佔有不少先機，（中略）保此一線關係，自是於學術大有裨益。⁶³

需指出，觀堂與北京大學的往來，尤其是學術資料方面的溝通，主要是通過負責相關事務的馬衡完成的，觀堂因此與馬衡私交甚篤。

- 56 Joey Bonner 曾考證觀堂、柯氏、羅氏相約投水事，三人關係之親密可見也。見 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6, 279.
- 57 彭玉平，〈王國維藏書之來源與批校之書考論——兼釋王國維遺書「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之義〉，《文學遺產》6（2022.11）：156-167。按：《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實由觀堂借自友人處，參看王國維，〈黑車子室韋考〉（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4卷，頁372）。又，北大國學門多次添置日本學術期刊，並獲贈「朝鮮總督府寄來」調查報告（1922年10月26日《北京大學日刊》），邀請日本相關學者進行為期一年《朝鮮史》「特別講演」（1922年12月9日《北京大學日刊》），則觀堂求購這些資料，應獲清華國學院支持。
- 58 參看《觀堂譯稿》相關篇目編者註，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9卷，頁673、684、693。
- 59 觀堂1925年10月致神田喜一郎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696。
- 60 王國維，〈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4卷，頁338-339。
- 61 陳鴻祥，《王國維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1），頁201。
- 62 《北京大學檔案》云：「下午五時臨時會議。（中略）校長提出委員會名單徵求同意。略有修正。修正後全體通過。委員會名單附後。（中略）（五）圖書委員：顧兆熊（長）、李大釗（當然）、陳世、葉瀚、宋春舫、陳啟修、朱希祖、孫國璋、馬衡。」王學珍、郭建榮，《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59。
- 63 彭玉平，〈王國維與民國大學之關係——以王國維與北京大學的離合關係為考察中心〉，《學術研究》10（2017.10）：2、109-126。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頁74-79）對相關問題做了詳盡論述。

論者認為馬衡於1919年12月31日邀請觀堂加盟北京大學，⁶⁴函云：

大學講席先生堅不欲就，而同人盼望之私仍未能已。擬俟研究所成立後先聘為通信研究之教授，不知能得先生同意否？⁶⁵

然是函寒暄云「久疏問候，想起居當安善也」，⁶⁶而馬衡於1919年12月22日曾致觀堂一函，⁶⁷系年應有誤，編者將是函系於1920年12月31日，當是。然馬衡確於1919年即與觀堂就《金石學講義》的修訂往來論學，這也為二人後續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馬衡返校後，由其促成的北大與觀堂之合作尚有以下數事：

第一，集資刊刻觀堂所校書籍。1921年末，觀堂校訂寫定唐寫本《切韻》，因經費問題未能刊印，馬衡受觀堂托擬請北大同人集股付印此書。此舉直接促成觀堂與北大之間關係升溫。⁶⁸

第二，關於內閣大庫檔案的往來。1922年5月上旬，北洋政府因經費支絀，將教育部轄下的歷史博物館所藏四分之三的明清內閣檔案售於故紙商，後羅振玉以三倍的價格購得。消息傳出後，北大國學門學者共同商議此事。5月12日北大校長蔡元培呈文教育部，請將內閣檔案撥歸北京大學。5月22日教育部批准北大呈文，同意北大整理這批檔案。⁶⁹而馬衡恰是檔案整理的重要負責人，觀堂曾致書馬衡詢以有關資料：

雪堂所得內閣故籍，就所檢理者已得聞其大略，恐非十年之功不能竣事。其大學所得一部，亮正在檢理，其第一等材料，能略示一二否？⁷⁰

足見觀堂對大庫檔案的珍視，北大保存檔案之舉無疑將進一步獲得觀堂好感。

第三，觀堂為北大國學門的建設提出建議。1922年10月14日，觀堂致函沈兼士：

前日辱手教，並屬提出研究題目，茲就一時鄙見所及，提出四條。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條，其事甚為煩重，非數年之力所能畢事，姑提出以備一說而已。⁷¹

觀堂為北大國學門開列的研究題目，正是日後他在清華國學院開設的課程。觀堂還建議北大開設滿蒙藏文講座：

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並關緊要。研究生有願研究者，能資遣法、德各國學之甚善，惟徐擇史學有根柢者乃可耳。此事况何不建議，亦與古物學大有關係也。⁷²

觀堂深知滿蒙藏文研究既為國際漢學界關注的熱門領域，作為國際性高等學府（中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不能不開設這一講座。⁷³清華國學院聘請精通東方語言文字的陳寅恪任教，應有類似考量。

64 彭玉平，〈王國維與民國大學之關係——以王國維與北京大學的離合關係為考察中心〉，《學術研究》10（2017.10）：2、109-126。

65 馬思猛輯註，《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頁25。

66 馬思猛輯註，《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頁25。

67 馬思猛輯註，《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頁3。

68 參看觀堂致馬衡諸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644-647。還可參看彭玉平，〈王國維與民國大學之關係——以王國維與北京大學的離合關係為考察中心〉，《學術研究》10（2017.10）：2、109-126。

69 馬思猛編著，《馬衡年譜長編》（北京：故宮出版社，2020），頁141-142。

70 1922年8月1日觀堂致馬衡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648。

71 1922年10月14日觀堂致沈兼士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685。此函寫作時間與下文致馬衡函同時，故係於同時。又，觀堂所擬研究題目還刊登於1922年10月27日、1922年12月14日《北京大學日刊》，且篇幅數倍於其他教授所擬者。可見觀堂治學善於總結心得，及其學術範式與新式學制之相契，更可見北大國學門對觀堂之倚重。相關通信後又以〈研究所國學門關於學術之通信〉為題發表於《國學季刊》第1卷第3號（1923年）。

72 1922年10月14日觀堂致馬衡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650。

73 榮新江云：「北大的研究所國學門，包含了多種學科的人材，而且從一開始就考慮到了它的國際性。」（榮新江，《敦煌學十八

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8月下旬，沈兼士復函觀堂，告以研究科章程、研究生人數、研究專案等事項。⁷⁴ 可以說，觀堂對於北大國學門的運作模式應有瞭解。⁷⁵ 1926年，吳宓曾試圖改革清華研究院章程，然未為觀堂認同。有論者分析：

王國維是大學者，他願意接受聘約到清華任教，除能開課授徒之外，大學校園靜謐的環境能助他著書立說。他不想被過多課程打擾。因此，他堅持研究院「專做高深研究」的定位，對吳宓研究院「兼辦普通國學」的提議不感興趣也不予支持也就屬題中之義。⁷⁶

此說實非。清華研究院主張專題研究亦為北大的運作模式。朱希祖即認為「過去史學系之課程，弊在全恃教員之灌注，而無自動的研究，且課程太繁，亦無研究餘晷」，「現代各國講授史學，半主自動，而不全主他動；自動須由自己研究參考，他動專重講授灌注。前項課程即不免偏於他動，全賴灌注」，⁷⁷ 因主張專門研究。較之吳宓的主張，觀堂無疑更認可北大國學門的運作模式。

此外，馬衡還應北大之請親赴洛陽等處實地考古，並與此期間發見大量出土文物，馬衡曾圍繞新發見的石經與觀堂往來論學。⁷⁸ 1924年後，觀堂雖與北大（國學門）斷交，然仍與馬衡有著私人往來，如函請其在清室

善後委員會工作之便協查其遺留宮中之私物。⁷⁹

觀堂在清華時期的不少學術活動，也需聯繫北大的學科建設經驗，才能得到準確闡釋。如1925年暑假期間，觀堂為學生會邀請向留校學生作公開講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發見之學問〉，時觀堂方入清華未久，故此一選題應有參考北大學術講座。1922年11月15日，北大召開二十五年紀念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出席者：羅惠僑、丁燮林、蕭友梅、李大釗、馬衡、李四光、蘇甲榮、譚熙鴻等委員，議決紀念會設學術講演、展覽、遊藝三部。講演的範圍為最近二十五年來學術史，由各科教授、講師自由認定擔任。凡校內外願聽講者，先期報名，領取聽講券。⁸⁰

馬衡曾為學子講授二十五年來之金石學，觀堂根據自己的學術專長，以新發見的學問為選題也是題中之義。

另外，觀堂選擇以蒙元史等為研究論題，可能還參考了當時學報的選題。如1924-1925年《學衡》《史地學報》刊載的相關論文有：鄭鶴聲〈清儒之史地學說與其事業〉、王桐齡〈介紹柯鳳蓀先生《新元史》〉、張星烺〈答東世澂君中國史書上之馬哥字羅質疑〉、柳翼謀〈馬哥字羅遊記導言序〉、⁸¹ 鄭鶴聲〈清儒對於「元史學」之研究〉、繆鳳林〈中國民族西來辨〉、鄭鶴聲

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頁152）這一選題還可以充分利用我國史書中有關的記載（尚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85-86），不至於陷入資料匱乏的窘境。彭玉平指出該主張與羅振玉的學術理念亦有關，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頁955。

74 馬奔騰整理，《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頁61。

75 北大國學門乃至整個北大的日常運作均刊登於《北京大學日刊》，觀堂極易獲知相關事宜。1924年8月9日《北京大學日刊》登載〈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會保存大宮山古跡宣言〉，不出數日，觀堂即擬定與北大斷交書。（參看觀堂1924年8月10日致沈兼士、馬衡函編者註，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690）足證其對《北京大學日刊》的關注。

76 尚太雲，〈文化神州喪一身：吳宓與王國維的日常交往及精神契通〉，《後學衡》2（2024.1）：111-147。

77 朱希祖，〈北大史學系過去之略史與將來之希望〉，轉引自尚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頁96。朱希祖至遲在1925年就有類似主張，同上註，頁95。

78 詳參虞萬里，〈王國維與馬衡的石經之緣——以三體石經考釋、復原為中心〉，《出土文獻》3（2020.9）：131-153。

79 1924年12月13日觀堂致馬衡函，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658。

80 《北京大學日刊》1922年11月17日，轉引自馬思猛編著，《馬衡年譜長編》，頁152。

81 據蔣復璁云，觀堂曾有「重譯馬哥字羅遊記，加以考證」的想法，蔣復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收於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頁123。

〈清儒對於元史學之研究（續）〉、柳翼謀〈奴兒幹事輯〉等，⁸² 以上兩刊皆為「學衡派」所主理，而學衡派的中流砥柱吳宓不僅時從觀堂問學，還引薦不少學友訪晤觀堂，⁸³ 則觀堂對於學衡派之報刊選題應有瞭解。

結語

丙辰年春，觀堂由日返滬。在羅振玉的引薦與支持下，迅速融入滬上學人群體。作為羅振玉在國內學界的重要代言人，觀堂憑藉羅氏的人脈與財力資源，迅速躋身學壇名流。在滬七年，觀堂又在沈曾植的指導下，逐漸形成闊闊的學術格局。當觀堂因缺乏甲骨資料而調整研究方向時，沈曾植於聲韻學及西北史地領域的指導，為他開闢學術路徑，發揮了關鍵引領作用。1922 年內閣大庫中蒙元史料的發現，是真正推動觀堂投身蒙元史研究的直接契機，而觀堂的學術周邊有深諳蒙元史的宿耆為其提供指導，是他得以迅速完成學術轉向的重要原因；在蒙元史研究中，觀堂還有意識與日本漢學家競爭。馬衡作為北京大學文獻資料的重要負責人，是觀堂

與北大開展合作的關鍵人物。在與馬衡的往來過程中，觀堂深入瞭解北大的運行機制，其清華時期的許多學術活動，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北大的經驗模式。觀堂後期治學仍是個不斷深化之歷程，身分、關係網絡等外部因緣對其學術演進的影響是顯著的。

在《觀堂集林》結集前，這批先後發表於學報的系列論文，已頗為學界所重，⁸⁴ 如胡適稱觀堂治學有「條理系統」，⁸⁵ 推崇其講求方法，顧頡剛、傅斯年等學界領軍人物，也深受觀堂著作啟發；⁸⁶ 至於觀堂對明治學界之影響，僅從日本漢學家悼念觀堂之盛狀便可見一斑。鑒於觀堂之近代學術史貢獻議題所涉甚廣，篇幅為限，不擬展開，僅陳一見：前輩學者多將觀堂視作純然史家，⁸⁷ 然考其治學進路，辛亥東渡日本後，為更好配合羅振玉的治學，觀堂將治學重心從集部、子部轉移至經部、史部，倘自「羅王之學」觀之，觀堂的學術底色更近經師而非史家。⁸⁸ 觀堂既成熟於「新史學」漸次成型之時期，則自「新史學」視角反觀其學術面向，難免有所局限；是故，欲在相關研究上有所深化，還需更深刻地把握近代知識結構轉型的時代語境。

82 期刊目錄見沈衛威，《「學衡派」編年文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83 尚太雲，〈文化神州喪一身：吳宓與王國維的日常交往及精神契通〉，《後學衡》2（2024.1）：111-147。

84 《觀堂集林》結集於 1923 年，而註 85 所引胡適日記，係其 1922 年所記；且胡適於日記中臧否觀堂之學，將其與羅振玉等學人並舉，則所談自是《集林》諸文。又，學報是觀堂學術得以迅速傳播的重要因素，而著作的結集無疑更助推了這點；而北大、清華同人在擴大觀堂學術影響中的作用同樣值得重視。

85 胡適 1922 年 8 月 28 日日記，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3 冊（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頁 734。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6（2008.12）：105-123、191）認為胡適推崇觀堂或受北大學人影響，事實上，觀堂在治學上與胡適追慕的那種「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多有相通之處，如重視方法，其稱〈魏石經考〉「前人實罕用此方法，故所解決之問題實頗不少也」，稱〈毛公鼎考釋〉「研究方法則頗開一生面，尚不失為一小種著述也」，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137、158。

86 如顧頡剛贊觀堂治學能「貫以統系」，見其〈悼王靜安先生〉，收於《顧頡剛全集》第 33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271-272。關於觀堂對傅斯年之影響，參看陳以愛，〈從疑古到重建的轉折——以王國維對傅斯年的影響為中心〉，收於《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3），頁 833-880。又，馮勝君對「新證」概念的深入分析，似跳脫出史學史研究的相關範式，頗予人啟發，馮勝君《二十世紀古文獻新證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1-7。

87 持此立場者除前引北大學人外，尚有陳寅恪（見其〈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等；郭沫若更是直言王氏乃「新史學的開山」，郭沫若，《十批判書》，《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 6。

88 洪國樑，《王國維之經史學》（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即持此立場；姚淦銘則根據程瑤田的治學規模，對觀堂的學術著作加以分類，見〈論王國維對程瑤田學術的承繼〉，《江淮論壇》6（1994.12）：91-95。觀堂的學術自識可參看其〈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 8 卷，頁 618-619。